

#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

## 第一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1987年10月

## 编者的话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它是各兄弟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共同缔造的。中国疆域的形成有个复杂的发展过程。在近代，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边境地区遭到了资本主义列强的蚕食鲸吞，边界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动，并遗留下一些历史悬案。

研究中国疆域的发展变化，研究边疆地区的历史沿革和边界问题，总结经验教训，这不仅是本学科发展的需要，同时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解决边界争端，处理中国和邻国的关系，开展国际文化交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加强国内各民族团结，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鸦片战争前后，我国有些学者，鉴于边疆危机的日益加深，开始注意边疆史地问题的研究，写出了一批论著。民国年间，不少学者继续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并出版了几本中国疆域史和中国边界变迁史的著作。顾颉刚先生创办的《禹贡》杂志，在推动边疆史地研究方面，成绩斐然，至今仍为史学界同仁所称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疆域史和边界史的研究，历史地图的编绘，都有很大的进展，例如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其规模之宏大，内容之精湛，都是前所未有的。但象我们这样历史悠久的大国，有那么长的边界线，有那么多的邻国，亟待研究探讨的问题很多。毋庸讳言，我们目前在这方面投进的人力还是很少的，出版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是为数寥寥，屈指可数。这同我们的一些邻国相比，差距明显。例如，苏联和印度，他们对疆域史和边界问题的研究，一向十分重视，在这方面，他们投进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有庞大的研究队伍，出版了大量的论著。他们不仅用本国文字出版，同时还用外国文字出版，竭力在国际上扩大他们的影响。其他邻国，也很重视古代疆域和近代边界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从科学性而论，国外出版的论著，比较严谨的学术著作固然有，但充满民族偏见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的作品也不少。这说明，组织人力，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开展中国疆域史和中国边界史的研究，已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它既是学术发展本身的要求，也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

疆域史和边界史的研究，涉及国家领土主权问题，学术界一向把它视为禁区。一般刊物因怕承担政治责任，多望而却步，致使疆域和边界研究鲜人问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促进疆域史和边界问题的研究，我们创办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这个学术性的内部刊物，为研究者提供一个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希望能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积极支持，共同来把这个刊物办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1987年9月

# 目 录

编者的话

1899年英国建议划定中印西段边界照会问题	金宗英	( 1 )
中国与锡金关系简述	吴丰培	( 19 )
十九世纪英俄争夺瓜分中国帕米尔地区述略	董志勇	( 26 )
驳柳条边“国界”说	吕一燃	( 41 )
中俄东部边界西段的勘定	步 平	( 46 )
南海诸岛是我国的领土，决不容许别国侵占	陈可畏、邓自欣	( 55 )
台湾学界边疆史研究一瞥	马大正	( 74 )
钓鱼列岛历史资料	於福顺、刘耀祖	( 78 )
关于外蒙古问题议案	北洋政府外交部政务司编 吴丰培整理	( 102 )

# 1899年英国建议划定中印西段边界照会问题

金宗英

中印边界西段的阿克赛钦问题是中印边界争端中的两大问题之一。1899年照会涉及到阿克赛钦地区。印度政府歪曲这一照会，引起国外史学界的广泛注意。本文根据个人见解，对此试做一些初步的讨论。

1899年3月14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Claude M. MacDonald）向清政府总理衙门递交了一份照会，建议两国谈判订约正式划定新疆与克什米尔之间的中印边界。照会中并对这段边界的划法提出了具体的建议。由于清政府拒未做答，结果谈判没有举行。

中印边界争端爆发之后，双方政府的立场出现了两点基本分歧：第一，中国政府认为中印边界是从未经过正式划定的；而印度政府则认为，它所主张的中印边界线是经过划定了的，没有理由举行全面的边界谈判。第二，中国政府认为，中印边界虽然未经正式划定，但是两国之间存在着一条双方历来管辖所及的传统习惯线，它的位置是同中国地图所画的中印边界一致，或极为接近的；而印度政府则认为印度目前主张的中印边界才是传统习惯边界。1899年英国的划界建议，虽然不了了之，并且也没有什么曲折的内容，但是对印度政府的立场却十分不利。因为第一，英政府提出了划定这一段边界的建议，这个事实本身就是这一段边界尚未划定的最好的证明；第二，这次照会中建议的边界线远在印度政府目前主张的边界线之南，因而又有力地说明了印度目前主张的边界线至少在这一段不是传统习惯边界。

1959年9月8日中国周恩来总理复函印度尼赫鲁总理，为了证明中国政府的中印边界从未经过正式划定的立场，在“关于中国新疆地方和西藏地方同拉达克接壤的一段边界”的标题下，列举了1899年的交涉做为一个例证。这一段标题是将新疆与西藏并列的，标题之下的文字，层次分明、词意清楚，本来无可指摘。但是印方为了回避对自己不利的历史事实，维护自己的立场，却对复函的文字大加挑剔。9月26日，尼赫鲁总理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说：“所谓直到1899年英国政府还曾经建议正式划定这段边界，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同意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在1847年到1899年间，并没有提出过进行这种正式划界的建议。英国政府在1899年提出的建议不是指拉达克和西藏之间的东部边界，而是指拉达克和克什米尔同新疆的北部边界。在这方面提到，北部边界沿着昆仑山脉直到东经八十度以东的一个点，然后与拉达克东部边界相接。这无可置疑地表明，阿克赛钦全部地区是处在印度境内的。中国政府并没有反对这个建议”。①

1960年两国官员就边界问题举行会晤时，印方再一次发挥这一论点，说：“1899年，英

①《印度尼赫鲁总理1959年9月26日就中印边界问题给周恩来总理的信》，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六集，第153—154页。

国并未建议划定拉达克和克什米尔为一方，西藏为另一方之间的边界。由于对洪扎（按即坎巨提）统治者的地位和权利有些讨论，英国政府就对同新疆接壤的克什米尔北部边界作了一番描述。那次叙述清楚地说明北部边界沿着昆仑山脉而行，到同拉达克东部边界相遇的东经80度以东一点。无疑，整个阿克赛钦显然是在印度领土内。中国政府对这一边界的规 定并未提出异议。”①

这两段话意思基本相同，在大段无的放矢的辩论之后，轻轻一带，却将1899年照会建议的边界线与印度政府目前主张的边界线混为一谈。

经过中国方面一再反驳，印方的《官员报告》在评论部分不得不对自己的提法稍作修改，说：“对洪扎统治者的地位和权利进行讨论的结果，英属印度政府为了酬答某些让步，提出把喀喇（拉）喀什河流域的一部分让与给中国；但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宁可遵循传统边界线。这样就证明了印度的论点，即边界是在印度政府现在所标明的地方。中国政府并不希望签订任何边界协定；如果传统边界线有了改变，这样的一个协定就是必要的了。他们宁可遵循传统边界线，而不愿签订对他们有利的边界协定。”②

这段话虽然略有新意，但与照会原意仍然相差很远，并且显得强词夺理更加难以自圆其说。

在这次会议里，中国方面对1899年照会作了全面而准确的概括。中国方面的《官员报告》说：“印度方面对于拉达克与中国新疆的边界一直没有提出任何条约协定来证明这一段边界业已正式划定。印方的书面发言只涉及1899年交涉。但正如中国方面所指出的，当时英国并非如印方所说的向中国描述克什米尔的北部边界，而是提出了具体的划界建议。英方在来照中明确提到，‘若照此定界，嗣后便认为中国之土’，并要求中国考虑和答复。可见这只是一个划界建议而已。如果认为，一次片面的建议就可以把别国的领土据为已有，那也是不可理解的。可以顺便提到，英国当时的建议还承认把喀拉喀什河河源一带全部留在中国境内，远在印度方面所主张的边界之南。现在，对于英国提出的这一划界建议并未为中国政府所接受的事实，印方也不得不承认，这就说明印度方面过去关于中国不反对1899年英国对边界划法的建议的说法是不真实的。但是，印方却作出这样奇怪的解释：中国政府所以不接受英国的建议线是因为中国宁愿接受一条对自己更加不利的边界线，即印度现在主张的边界线。这种说法当然是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的。”③

细读中方的发言，可以看到它从四个方面驳斥了印方的说法：第一，1899年照会是一次具体的划界建议，而不是对边界的描述；第二，照会中的建议线把喀拉喀什河河源全部留在中国境内，远在印度现在所主张的边界线之南；第三，中国政府对这一次建议没有接受，而不是对它的建议线没有异议；第四，印方所谓中国宁可接受对自己更加不利的边界线的说法是荒诞无稽的。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一发言十分令人满意，它既符合事实，又比较全面而准确地驳斥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和印度政府官员关于边界问题的报告》（以下简称《官员报告》），中文本，印方，第61—62页。

②同上，中文本，印方，第70页。

③同上，中文本，中方，第17—18页。

了印方发言中的错误。可是在西方，情形却完全不是如此。当时帝国主义与各国反动派孤立中国，在中印边界争端中，西方资产阶级舆论几乎不分是非地全面倒向印度。在这一具体问题上，印度政府的言论一经公布，印度甚至英国的无数作者，包括历任英国和印度驻西藏代表的H.E.黎吉生（H.E. Richardson）在内，在没有看到1899年照会原文的情况下，纷纷摘引印度政府的言论，众说纷纭，大放厥词。少数正直人士和坚持科学态度的历史学家却显得是非难辨、茫然无措。这种情况固然由于照会原文难得，但是印度外交部暗地篡改中方发言却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1961—62年中印两国外交部分别公布了双方的《官员报告》，中国外交部原为自己的《官员报告》提供了准确的英译本，印方编印双方《官员报告》时，是否全部弃而未用，由于我手边没有这种版本，不便贸然肯定。但从多萝西·伍德曼《喜马拉雅边疆》（Dorothy Woodman, Himalayan Frontiers）一书的引文中，我们读到印度外交部本的中方这一段发言的译文，却是全部另译了的。在短短二十七行的一段文字中，变换字句损害原意的不止一处。甚至于将“英国当时的建议还承认把喀拉喀什河河源一带全部留在中国境内”一句中的“留在”二字，改为“不留在”，①致使上下文不能呼应，令人无法卒读。如果伍德曼女士的引文没有错误的话，应该说对这种关键文字的篡改确乎是不严肃的，不象一国政府所应具有的行径。多数西方读者读汉文有困难，而读英译本者，又多半取用印度外交部本，由于这种别有用心的错误译文的混淆，而对中国方面的态度产生一些不应有的误解是不足为怪的。英国史学家阿拉斯泰尔·兰姆（Alastair Lamb）说，既然印度政府重要的官方文件如此歪曲照会原意，究竟是什么原因中国方面不予指出，并且始终不做回答呢？表示十分困惑不解。②他估计中国方面可能保有照会的原文，言外之意似乎对于中国有无此项照会原文也有疑问。

在西方学术界中，兰姆先生是最早从英国档案中查出1899年照会原文，并证明印方歪曲了原意的人。1962年，当他看到美国史学家R.A.胡春贝克（Robert A. Huttonback）等三人合著的《喜马拉雅战场》（Himalayan Battleground: Sino-Indian Rivalry in Ladakh）一书的清样时，曾将此事告知胡春贝克，于是这一问题首先在《喜马拉雅战场》一书中揭露出来。1964年，兰姆在他自己所著的《中印边境》（The China-India Border）一书中附录了1899年照会全文，对印度政府官方文件歪曲原意做了更为详细的揭露。以后在R.A.胡春贝克、W.F.范·埃克林（Willem F. van Eekelen）、D.伍德曼、K.古普塔（Karunakar Gupta）和N.马克斯韦尔（Neville Maxwell）等人的论文和专著中纷纷谈到这一问题。1973年，A.兰姆在他的新著《拉达克部分的中印边境》（The Sino-Indian Border in Ladakh）一书中着重的研究了这份照会，并且利用现代地图仔细地考察了这一条建议线的准确位置。兰姆对1899年照会的研究用力最多，伍德曼说：“这条建议的边界线，直到1964年，A.兰姆将它复原以前，似乎从来没有按照原来的样子被再考虑过”。③

A.兰姆等人对1899年照会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遗憾的是他们普遍没有使用中国史

①印度外交部编：《印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政府官员关于边界问题的报告》，新德里，1962年，英文本，中方，第16—17页。转引自D.伍德曼，《喜马拉雅边疆》，纽约，1969年，第265—266页。

②A.兰姆：《拉达克部分的中印边境》，堪培拉，1973年，前言。

③D.伍德曼，前引书，第102页。

料。由于单纯依靠英国史料的结果，他们在论证印方歪曲照会原意时，显得不够深入；在考察建议线的位置时，显得不够准确（见本文第5页注④）；在谈论中国政府内部情形时，也出现了不少的错误。我们发现，将双方的记载相互核实与补充之后，无论从进一步论证印方对照会原意的任意曲解，还是从澄清这一段历史的真相来说，都得到了很多的帮助。以下分为五个问题来探讨：

### 一、印方对照会原意的任意曲解

中英两国政府之间来往照会，习惯使用英、汉两种文本。1899年英国建议划定中印西段边界照会的英文本，见A·兰姆《中印边境》附录2（第180—182页）；汉文本见《新疆图志·国界志》第五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新疆巡抚文》（第31—33页）。汉文本按照当时的习惯，将公历改为旧历，公元改为光绪年号，边界地名与现在通行写法也多有不同。为了便于探讨与比较，现依《中印边境》一书的附录，将英文本重新译出，又将汉文本加了标点，一并附于本文之后。

印方对照会内容和这一次交涉的歪曲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将划界建议歪曲为边界的描述；二是将中国政府的拒未答复，歪曲为未表异议；三是对照会的建议线断章取义；四是对建议线的文字任意曲解，将当年照会建议的边界线与今天印度政府主张的边界线混为一谈，并且据为今天印度政府主张的边界线的条约根据。对于前三个问题，中方的《官员报告》已经做了准确的驳斥，不需要再做更多的讨论。只有最后一个问题，当时中国方面根据照会的汉文本，无法做出具体的驳斥。以下本文专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照会英文本建议的边界线中有关阿克赛钦部分，有如下一段很长的字句：“从喀喇昆仑山口起，边界线沿山脉的山顶向东行约半度（100华里），然后转向南到达略低于北纬三十五度之处。然后绕过在我们地图上标明的喀拉喀什河河源，顺山势而行向东北到达克孜勒吉勒尔以东一点，并从那里向东南顺拉宗山脉而行，直到与昆仑山脉的一个南伸支脉相遇，这个支脉在我们的地图上迄今标明为拉达克东部边界。这一点位于东经80度略东。”①

如前所述，印方的《官员报告》谈到照会的这一段内容时却说：“那次叙述清楚地说明北部边界沿着昆仑山脉而行，到同拉达克东部边界相遇的东经80度以东一点。”②（尼赫鲁总理信件提法基本相同）③

初看之下，二者距离很远，不容易理解。然而，仔细考察照会英文本的原文之后，却可确定，印方说法不过是把照会上述引文的末尾“这个支脉在我们的地图上迄今标明为拉达克东部边界。这一点位于东经80度略东”一段任意曲解而已，这个问题来源于英语句法，因此必须摘引原文。

照会的上述引文后半段的原文是：“Rounding then what in our maps is shown as the source of the Karakash, the line of hills to be followed runs north-east to a point east of Kizil Gilga, and from there in a south-easterly direc-

①本文附录二。

②同本文第2页注①。

③同本文第1页注①。

tion follows the Lak Tsung Range until that meets the spur running south from the K'un-lun range, which has hitherto been shown on our maps as the eastern boundary of Ladakh. This is a little east of 80° east longitude.” ①

与印方任意曲解问题有关的是这一段文字的末尾, “which has hitherto been shown on our maps as the eastern boundary of Ladakh.” “This is a little east of 80° east longitude.” 前者是一个非限制性定语从句, 它与主句的关系比较松散, 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 即使省略, 也不影响主句的叙述。后者则是一个单独的短句。

曲解的关键在于这一定语从句的先行词, 如果把它指为“支脉”(spur), 末尾一段应读为“这个支脉在我们的地图上迄今标明为拉达克东部边界。这一点位于东经80度喀东”。如果把它指为“昆仑山脉”(K'un-lun range), 则可读为“至今我们的地图都把昆仑山脉标示为拉达克的东部边界。这一点位于东经80度喀东。”前者是正确的读法, 后者则是一种曲解。印方的说法就是在这一曲解的基础上任意发挥而来的, 因此是曲解之上再加曲解。

为什么说后者是一种曲解呢? 本来原文的语意和上下文已经足以说明这一问题, 以下我们借助照会英、汉两种文本的比较和洪钩地图对此试做一些更为确切的解释。

照会英文本上述引文末尾的意思是: “……顺拉宗山脉而行, 直到与昆仑山脉的一个南伸支脉相遇, 这个支脉在我们的地图上迄今标明为拉达克东部边界。这一点位于东经80度喀东。”当年, 英国外交当局可能认为这样的字句用汉文表达十分不便, 因而按照原来的语意, 在汉文本中直接写为: “顺拉宗山岭归昆仑山南伸支岭阿克赛成平川界上。该处在图上东经五十度, 北纬三十五度零十分。” ②这样一来, 英、汉两种文本就出现了差异。我们对照英、汉两种文本, 可以发现, 这是它们之间唯一的一处貌似实质性的差异。

这个差异是怎样产生, 又应如何解释呢? 我认为与洪钩地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汉文本原来已经点明: “查印度所拟之界, 按阅光绪十六年原任总署洪大臣所著《中俄交界全图》便知。” ③(英文本有关字句大意相同)。洪图是从一部俄国地图翻译而来的, 使用了俄国的经度标准。俄国经度标准的“东经50度”, 约略相当于通用标准的“东经80度”。因此, 汉文本将“东经80度”改为“东经50度”, 显然是根据洪图而来。这样的改动, 虽不准确, 然而大体上是相当的。洪图在东经50度附近北纬36度以南画出一个昆仑山的分支山脉, 迤逦向南, 这就是照会中所说的“南伸支岭”。洪图在这个“南伸支岭”之东又标出“阿克赛成平川”六个字, 因此“阿克赛成平川”的西界就相当于“南伸支岭”。“阿克赛成平川界上”的意思是“在阿克赛成平川一带的边界上”, 换言之, 就是“在南伸支岭一带的边界上”, 因此, 它与英文本中“这个支脉在我们的地图上迄今标明为拉达克东部边界”的意思也是相当的。此外, 洪图虽然未用文字标明“拉宗山岭”和“南伸支岭”, 但是这两条山脉的轮廓在图上却是依稀可见的, 二者的交接点约略在东经50度, 北纬35度零10分。④因此汉

①A·兰姆·《中印边境》, 伦敦, 1964年, 附录2第182页。

②本文附录一。

③本文附录一。

④当然, 洪图这样的画法是完全错误的。按照现代测绘结果, 拉宗山脉在克孜勒吉勒尕以东向东南行, 至北纬35°以南; 昆仑山脉在东经80°左右并没有什么向南延伸得很远的“南伸支岭”; 并且阿克赛湖也要靠南靠东。实际上, 若自克孜

文本的“该处在图上东经五十度、北纬三十五度零十分”，用于指明这个交接点，比较英文本的“这一点位于东经80度略东”，要明确得多。

英、汉两种文本的上述一段文字，表面看来有很大差异，但是对照洪图阅读，却又发现它们的内容实际上十分一致。这些情形作为佐证，对于我们论证印方任意曲解照会的原意有着很大的帮助。

现在我们转回来再谈前述定语从句的先行词问题。在英语句法中，定语从句虽应尽可能地紧接在先行词之后，但行文中也常有例外。在前文引述的长句里，从语意和上下文来看，我们所讨论的定语从句的先行词是“spur”。而从句型结构来看，这一定语从句若紧随在“spur”一字之后，十分不便，因此它被安排在稍为靠后的位置，并在引入这个定语从句的关系代词“which”之前标上逗点。这是英语中的惯常写法，意思明确，并无含糊不清之处。这样读做“……顺拉宗山脉而行，直到与昆仑山脉的一个南伸支脉相遇，这个支脉在我们的地图上迄今标明为拉达克东部边界。这一点位于东经80度略东”。上下文文义衔接，互相之间也没有什么矛盾。重要的是，将其中的定语从句读为“这个支脉在我们的地图上迄今标明为拉达克东部边界”，与汉文本“阿克赛成平川界上”的语意完全相符。汉文本的语意是当年英国外交部自己做出的解释，是这一句话应该如此理解的一个最为有力的佐证。反之，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将这一定语从句的先行词指为“K'un-lun range”，读做“……顺拉宗山脉而行，直到它和昆仑山脉的一个南伸支脉相遇，至今我们的地图都把昆仑山脉标示为拉达克的东部边界。……”联系上下文，却会产生一系列的困扰。印度当局恰恰是这样做的，事实证明，他们也因此而陷于一系列的困扰之中，而不得不在曲解的基础上再加曲解。

如前文一再摘引过的，尼赫鲁总理的信件说：“在这方面提到，北部边界沿着昆仑山脉直到东经八十度以东的一个点，然后与拉达克东部边界相接。”①印方《官员报告》说：“那次叙述清楚地说明北部边界沿着昆仑山脉而行，到同拉达克东部边界相遇的东经80度以东一点。”②

对照原文，我们不禁要问：

一、所谓“北部边界”一语从何而来呢？照会中的文字究竟哪一处写有“北部边界”的字样呢？没有。因此，这个显然是无中生有。

二、所谓“昆仑山脉……同拉达克东部边界相遇”又是从何而来呢？照会中也没有这样的字句，原来也是无中生有。

三、所谓到同拉达克东部边界相遇的“东经80度以东一点”又是从何而来呢？这个显然是把随后的一个短句与前面的定语从句凭空地拉扯到一起罢了。“这一点位于东经80度略东”是一个单独的短句，已有句号将它与前句隔开，它是与前文主句并列的。因此，它是前

勒吉勒尔向东偏南，到达东经 $80^{\circ}$ 、北纬 $35^{\circ}10'$ 划一条线，则势必要穿过阿克赛湖，并且在那以东也没有什么两条山脉的交接点，这个恰好说明1899年英国当局提出的建议线全无事实根据，纯属纸上空谈。A·兰姆在他的《拉达克部分的中印边境》一书中，按照现代地图，把1899年建议线的终点确定在东经 $80^{\circ}$ 略西、北纬 $34^{\circ}50'$ 上下，（见该书附图8、15、19），这是因为他没有读到1899年照会汉文本的缘故。

①同本文第①页注①

②同本文第②页注①

文主句叙事的继续，而绝不是对一个与前文主句关系松散的定语从句的补充。从英文本的原文来看，句法十分清楚，两者是拉扯不起来的。汉文本写做“该处在图上东经五十度、北纬三十五度零十分，”则词意更加明确，由于加上了纬度，已经没有任何混淆的余地。因此，“这一点位于东经80度略东”的意思，是指“拉宗山脉”与“南伸支脉”的交接点。若把它指为什么“拉达克东部边界”与“昆仑山脉”的交接点，显然是张冠李戴。

印方为什么要无中生有、张冠李戴呢？推其原因，第一不外昆仑山是一个东西行的山脉，将它混指为拉达克东部边界，似乎印方自己也觉得实在说不过去，因而任意地加上了“北部边界”四个字罢了。第二，昆仑山脉绵延数千里，指为拉达克边界，又止于何处呢？因此又只好无中生有地提出昆仑山脉与拉达克东部边界相遇，并且把随后的一个短句拉扯进来，指为它们的交接点。

这些事实证明了，任意曲解和无中生有、张冠李戴是分不开的。有了任意曲解，由于语意不合，必然产生无中生有和张冠李戴。反过来，无中生有和张冠李戴也证明了，把上述的先行词指为“昆仑山脉”是一种任意曲解。

必须指出的是，印方《官员报告》的“那次叙述清楚地说明北部边界沿着昆仑山脉而行，到同拉达克东部边界相遇的东经80度以东一点”这段话是在“印度西段边界的条约根据”部分提出来的。在这里，它是“整个阿克赛钦显然是在印度领土内”的独一无二的条约根据。因此，这段话的意义无论如何也是不能低估的。上面我们用许多篇幅讨论了这条孤证，揭开来看，原来不过是断章取义、任意曲解、无中生有、张冠李戴；不过是玩弄了英语句法中的一个并不高明的把戏而已。拿这样的货色做为孤证，做为条约根据，难道印方自己不觉得过于脆弱、过于荒唐了吗？如果说这种做法是将堂堂的国际交涉视同儿戏似乎也不为过。

## 二、英政府提出1899年照会的历史背景

新疆南部原来不与克什米尔接壤，它们之中自东而西隔着拉达克、巴勒提和坎巨提。拉达克和巴勒提属西藏管辖，坎巨提则是一个向清政府直接朝贡的藩属。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克什米尔的锡克族统治者先后占据了拉达克和巴勒提，四十年代经过两次锡克战争英国又吞并了克什米尔，因此拉达克与巴勒提先后落入英国手中，从此这一带的东部开始变为中印之间的国际边界。在英国派员单方面勘查了拉达克与西藏之间的边界之后，1865年，印度测量局的制图师约翰逊（W.H.Johnson）又到阿克赛钦非法测绘，并在地图上画出了一条远在阿克赛钦以北的边界线，后来习惯称之为约翰逊线。

英国在阿富汗、俄国在中亚诸汗国不断扩张势力。1865年初，中亚地区浩罕的野心家阿古柏（Yakoob Beg）占据了新疆南部，在其后的十余年中，出现了英俄争夺新疆的一次高潮。1878年，中国消灭了阿古柏政权重新控制新疆南部之后，英俄侵略新疆的野心并未停止。特别是新疆西南部的帕米尔地区，由于英俄对中亚的争夺继续发展，逐步变成为英俄争夺的焦点。为了争夺帕米尔，1891年英国派兵占据了坎巨提。

1887年起俄国派遣军官康穆才甫斯基（Громъчевский）潜入帕米尔、叶尔羌、和阗等地侦察、游历。在此前后英国也派荣赫鹏（F.Younghusband）前往，进行同样活动。1890

年莎车知州潘震告诉荣赫鹏说，新疆与拉达克分界在喀喇昆仑山口，中国的边界沿喀喇昆仑山和印度河与塔里木盆地之间的分水岭而行①。不久，荣赫鹏的旅伴马继业(G. Macartney)充当英国克什米尔高级专员的中国事务特别助理来到喀什噶尔。1893年，喀什官员又向马继业做了同样的声明②。为了抵制英俄的侵略活动，1891年至1892年，新疆当局派遣海英与李源纲分别踏勘了帕米尔、喀喇昆仑山北侧直至阿克赛钦一带的边境地区，他们画出了多幅边境地图，并且分别提出了详细的报告。

1895年3月，英俄终于背着中国政府签订了瓜分帕米尔的协定。中国反对英俄私分帕米尔，拒不承认英俄协定，因而中俄之间划定帕米尔未定界的交涉拖延下来，始终不能达成协议。英国政府认为这是1895年英俄协定留下的一个漏洞，时时考虑俄国突破中俄未定界之后将会如何行动，注意力转而集中到克什米尔与新疆的边界上来。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甘肃地区的回民起义又接连不断，1895年4月，马继业报告英印政府说，新疆局势比较六、七十年代还要危险，俄国吞并喀什近在目前，必须为此项作准备。马继业提出最好寻找借口在喀喇昆仑山脉以北建立一个缓冲地带。他说坎巨提统治者在色勒库尔以南的塔克敦巴什帕米尔有一些传统的权利，又在星嵌尔山口以北的喇斯岸穆地方有领土要求，此外，1864年克什米尔大君一度派出少数士兵到赛图拉保护商旅，并且为此修建过碉堡一处。他认为这些都可以做为制造缓冲区的借口，至少应该据此与中国订立条约，讲明这些地方中国一旦不能控制，只许让与英国，不许让与俄国。印度总督埃尔金(Elgin)和英国印度事务大臣汉弥尔顿(G. Hamilton)赞成马继业的设想。埃尔金认为当时是向中国提出划定这段中印边界的好时机，不过英国人自己对于边界的划法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主张。从此，马继业的备忘录在印度政府内部引起了一场关于这段边界划法的争论。

1896年，喀什噶尔道黄光达根据李源纲的调查报告向马继业指出阿克赛钦地区是中国的领土。不久，马继业将一部1894年刚刚出版的由庄士敦(A. K. Johnston)等人编绘的《印度地图集》交给黄光达转赠新疆巡抚。这部地图集标明阿克赛钦及其附近地方在英国境内，马继业据此与黄光达反复辩论。10月，黄光达奉巡抚之命再次向马继业提出这一问题，马继业理屈词穷，向英印政府报告说：阿克赛钦是一块“在拉达克东北的地势高峻的台地，大概一部分是在中国境内，一部分是在英国境内”③，英国地图在这里没有正确地标明边界。12月，英印政府的《西北边界情报报告》指出马继业的设想是正确的，说明英印政府外交部中部分官员同意了马继业的阿克赛钦北部划归中国，南部的林济塘一带划归英国的分治方案。

马继业的帝国主义者的观点虽已相当嚣张，但他在英印政府中还只能算做是温和派。不久，英国总参谋部军事情报处处长约翰·阿尔达(John Ardagh)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顿然成为前进派的代表人物。阿尔达是英政府中的印度问题专家，他主张应尽可能地把俄国人

①FO 531/51，第3号，附1890年9月5日叶尔羌大臣包(按应为潘)与荣赫鹏谈话。转引自A·兰姆：《拉达克部分的中印边境》，第31页。

②FO 65/1434，1894年1月15日印度部致外交部函，附1893年9月28日马继业函，转引自同上书，第31页。

③A·兰姆：《拉达克部分的中印边境》，第36页。

粗挡在远离印度的地方。他认为如果俄国占领南疆之后，无论从帕米尔，或者从塔什库尔干河、叶尔羌河、喀拉喀什河等河谷，它都可以向喀喇昆仑山的各个相应的山口发动进攻。他主张横截这几条河谷的上游建立边界，以此做为抵抗俄国的防线。1897年1月1日，他向英国外交部和印度事务部提交了一份题为《印度北部边界——从帕米尔到西藏》的备忘录，在这一备忘录里他按照自己的主张设计了一条远在喀喇昆仑山以北的边界线，后来一般即称之为阿尔达线。不久，阿尔达考虑到中国政府在赛图拉等地设立边卡为时已久，若把赛图拉、素盖提等地划入英国界内，中国政府恐怕不会应允，因而又设计了一条位于赛图拉、素盖提以南的代替线。

英印政府中的温和派认为阿尔达纵然提出了代替线，但有许多问题依然不能解决。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在喀喇昆仑山口久已设立界牌；中国的莎车和喀什当局早已向荣赫鹏和马继业声明过，新疆与拉达克之间的分界在喀喇昆仑山口，中国的边界沿着喀喇昆仑山和印度河与塔里木盆地之间的分水岭而行；1896年，为了阿克赛钦地区的主权问题，喀什当局又与马继业进行过反复的辩论，因此，阿尔达的代替线也是行不通的。

1897年春，英国鼓动坎巨提派人到喇斯库穆耕种土地，新任莎车知州派人制止，拘留看苗人两名。坎巨提头人见势不妙，不听英国唆弄，派人来喀什好言恳求，喀什当局允许拨给土地五小块。俄驻喀什领事彼得洛夫斯基(Н.Ф.Петровский)认为这是英俄私分帕米尔之后，英国人在其以东的边界上又在打新主意，是一次新的阴谋的前奏，极力劝告喀什当局不要准许坎巨提人前来耕种。喀什道黄光达提出可向坎巨提农民征收地租，借以防止涉及主权问题。俄领事仍然不满，扬言若如此办理，俄人将在别处采取类似行动。

经过这一番试探之后，英印政府中的温和派更加反对阿尔达的主张。印度总督埃尔金认为如果提出阿尔达线，不仅将损害中英关系，并且将会适得其反地引起俄国更加积极地向前推进。他说：“我们看不出把边界推到这道大山的另一边有什么战略上的好处，因为越过大山入侵印度的事情是不致于发生的”<sup>①</sup>。埃尔金一再说明，他的看法是根据亲身到过这一地区的军官们的报告和意见而形成的，与阿尔达的看法完全不同。他认为喀喇昆仑山虽然不容易设防，但是如果把边界推到山的北侧，那么在前沿与后方之间将会出现一个交通极为困难的地带，在战略上是十分不利的。

1898年春，英国得知中俄双方正在就帕米尔未定界举行一轮新的谈判，十分担心俄国对色勒库尔和塔克敦巴什帕米尔提出要求。英印政府的驻吉尔吉特政治委员负责有关坎巨提事务，这时担任这个职务的正是后来在西姆拉会议中一手炮制麦克马洪线的亨利·麦克马洪(H. McMahon)。麦克马洪提出，俄国一旦取得喀什，或者甚至于一旦取得色勒库尔和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就有可能提出接收中国对坎巨提的权利，对此英国应该早做准备。他主张对色勒库尔和塔克敦巴什帕米尔最好也取得优先让与权。

印度总督埃尔金认为如果采取直接切断中国与坎巨提关系的办法，似乎更为聪明。1898年10月27日，他向印度事务大臣汉弥尔顿提出了一项详细的建议，主要内容是以英国代表坎巨提放弃对色勒库尔等地的要求，换取中国放弃对坎巨提的宗主权，同时建议了一条具体的边界线。

<sup>①</sup>印度政府外交部致汉弥尔顿函，1897年12月23日，转引自D·伍德曼，前引书，第365页，附录6。

埃尔金设计的这一边界，中段按照他自己的主张，除去喇斯库穆地区的一小块之外，基本顺着喀喇昆仑山山脊而行，东西两端则各有不同。西端考虑最多。1895年英俄私分帕米尔，标定了一段所谓的俄阿边界，它的东部终点是波万洛·什维科夫斯基峰。<sup>①</sup>在所谓的俄阿边界之南，有一条名义上属于阿富汗的瓦罕走廊。这是英俄之间经过勾心斗角、苦思焦虑而留下的一条缓冲地带。埃尔金认为要划中印边界，如果不与波万洛·什维科夫斯基峰联结起来，那是不行的。他认为在这里不能给俄国人留下任何空隙，否则的话，不管缺口多么小，俄国人从这个缺口绕过来，打进一个楔子，则苦心设计的瓦罕缓冲区就白费了。结果，埃尔金的建议线，西端从波万洛·什维科夫斯基峰开始，向东南几乎画一直线，渡过卡拉秋库尔苏河，到达卡前乃山口，不单完全脱离了喀喇昆仑山主脊，在中印边界之外，又包括了一小段中国与阿富汗之间的边界，并且将中国与坎巨提之间在卡前乃山口以西的传统习惯边界完全置于不顾。至于东端，阿克赛钦地区，考虑的没有那么多，只是依据马继业提出的把阿克赛钦一分为二的粗略的设想，在地图上找出了若干标志。埃尔金在描述过这些具体标志之后，不打自招地说：“我们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既精确而比例尺又大的地图可以把整个这一条线画出来。”<sup>②</sup>

1899年1月，寇松（Curzon）接替埃尔金担任印度总督，寇松在对俄斗争的方针上与埃尔金意见不同，对于中印西段边界的交涉，虽在酝酿着新的态度，但还没有正式提出。不久，英国政府批准了埃尔金的建议，1899年3月授权驻华公使窦纳乐向中国政府提出<sup>③</sup>，从此展开了关于划定这一段边界的一次正式的交涉。

### 三、关于洪钧地图

1899年照会一再提到洪钧地图。洪钧自1887年至1890年出任中国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在任期间，描摹并翻译了一部有关中俄边境地区的俄国地图，因为汉字难以缩小，遂将全图分割，自上至下分为金、木、水、火、土五个字，自右至左分为一至七号，共计三十五幅，回国后出版，题名为《中俄交界全图》。洪钧描摹俄图将帕米尔地区的苏满等处卡伦画在界外，受到大理寺少卿延茂的严词弹劾。由于得到与洪钧共同在总理衙门任职的各大臣具词缓解，方始免遭处分。1893年洪钧去世，而舆论非议始终不能平息。

洪图所依据的俄图原本，不只对帕米尔中俄未定界画法错误，事实上，它对克什米尔与新疆之间的中印边界的画法也是错误的。图中所画这一段中印边界远在喀喇昆仑山脉之北，显然是来自英国地图的一种模仿和抄袭。不久，洪图中有关的这两幅经马继业之手传入印度，造成了深远的恶劣影响，国内一时并未察觉。

马继业是1893年在喀什看到《中俄交界全图》的，时间较晚。他首先描摹了洪图中有关帕米尔中俄未定界的第28图（火七），将其中若干汉文地名改为罗马字母拼音，递交英印政府。马继业说明它是有关中俄边境地区的共有三十五幅的一部地图集中的一幅，又说这部地

<sup>①</sup>或译帕万洛·斯维伊科夫斯基峰，又名克克拉去考勒峰。

<sup>②</sup>埃尔金致汉弥尔顿函，1898年10月27日，第198号。转引自A·兰姆：《中印边境》，第103—104页。

<sup>③</sup>在正式照会中没有使用波万洛·什维科夫斯基峰的名字，改为“英俄标界委员会于1895年结束其工作的那座小帕米尔的山峰”。汉文本中称为“停待之山尖”。

图集是在上海公开发售的。7月，他用同样办法，又描摹了有关克什米尔与新疆边界的第35图（土七），送回印度。马继业报告说：这是一幅“表明中国与英属克什米尔领土之间边界”的地图，引人注意的是“若以印度河与叶尔羌河流域之间的分水岭为界，可以料到边界是沿着喀喇昆仑山脉的山脊而行。这幅地图画出的这一边界不是如此，而是或多或少画在那条分水岭之北，并且沿着1889年荣赫鹏上尉探查过的叶尔羌河的那一部分河岸而行”。又说：“把我们的边界扩展到喀喇昆仑山脉北侧是否有益，这是我没有资格发表意见的一个问题。但是据说坎巨提在它的公认边界之外还拥有一些地方，究竟是提出还是放弃这种权利要求更为可取，我想到了俄国人可以夺走色勒库尔和喇斯库穆的所有权的那一天，我们可能不得不从一种战略的眼光去加以考虑。当那种意外局面出现时，将会发现掌握我们能够发现的表明中国边界实际上最远从未延伸到喀喇昆仑山的一切证据，是对我们有用的。因而，洪大臣的这幅地图就可能并非毫无用处。”<sup>①</sup>马继业报告说，洪大臣的全名是洪钧，是中国前任驻圣彼得堡的公使，这些地图是洪钧在圣彼得堡亲手所画，它们代表了中国的官方见解。

我们在伍德曼的《喜马拉雅边疆》一书中看到了马继业描摹的“洪大臣图”的第二幅。图上加注：“中国前任驻圣彼得堡宫廷公使洪大臣绘制的地图的一部分的描摹本，表明中国土耳其斯坦与英国克什米尔之间的边界。”<sup>②</sup>

马继业的报告以及他在“洪大臣图”上所加的注释，内容相同，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原来，洪图第一幅（金一）的右上角有如下一段题记：“俄国是图成于光绪十年，在立约定界而后，西入尚游历，讲奥地，无一二十年不修改之图，故新胜于旧。……原图宽广仅四、五幅，今摹绘之展为三十五幅，由于中国字体不能再收缩也。……光绪十六年四月洪钧识。”<sup>③</sup>这段题记明明说此图是一幅俄国地图，经本人摹绘，译成汉文。马继业的报告将它说成是“洪大臣绘制的地图”，显然不符事实。

我们将马继业描摹的“洪大臣图”与洪图的“土七图”比较，二者面目完全不同。马继业的描摹本里没有绘经纬度，喀喇昆仑山脉完全用另外手法表示，其他山脉一概省略，略去的地名不下十分之九，只不过着重地勾画了边界线，将沿线地名的汉文改为罗马字母拼音而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洪图“土七图”上“阿克赛成平川”六字原来标在东经80度以东，马继业的描摹本改为“阿克赛钦”，并改标在东经80度以西。这样的图与其说是洪图“土七图”的描摹本，还不如说是马继业自己画的。

马继业这样草率描摹与翻译的“洪大臣图”，加上所谓这一地图原是洪钧亲手所绘，代表中国官方见解等等歪曲的报告，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果然，马继业所说“洪大臣的这幅地图可能并非毫无用处”的话，很快被英政府使用，在1899年照会里就被拿来当做对中国政府进行威胁利诱的工具。

可以顺便一提的是，直到1960年中印两国官员因边界问题举行会晤时，印方竟仍然举出这一幅“洪大臣图”做为证据。马继业在“洪大臣图”上注释说，这是“洪大臣绘制的地图

<sup>①</sup> 马继业致巴尔（Barr）函，克什米尔常务高级专员，1893年7月23日，转引自A·兰姆：《拉达克部分的中印边境》第34页。

<sup>②</sup> D·伍德曼，前引书，第82页，附图6。

<sup>③</sup> 洪钧：《中俄交界全图》。

的一部分的描摹本”，印方的《官员报告》干脆直截了当地称为“洪大臣绘制的一幅地图”，并且进一步引伸为“中国官方的地图”。①马继业的注释原已不符事实，印方《官员报告》的说法当然是离题更远了。

#### 四、中国政府拒不答复这一照会的经过

1899年3月14日窦纳乐递交照会之后，4月7日，总理衙门通知他，此事正与新疆巡抚商，候得回信再做答复，其后始终没有下文。马继业报告英印政府说，他在喀什探听到总理衙门确将照会送来新疆，巡抚表示赞成，等等。他的报告是不确实的。

《新疆图志》一书全文收录了新疆巡抚饶应祺答复总理衙门的咨文，内容是一清二楚的。当时饶应祺命喀什道黄光达对英使照会进行审查，所提查复意见大致有五点内容：

第一，根据海英与李源钢的地图和报告，参考洪钧、许景澄所译地图和英国出版的帕米尔地图，一一核对了有关地名，尽可能确认照会中建议的边界线的具体位置；

第二，剀切地指出了洪图不足为凭，说：“西人精于测绘巧于埋奸，洪大臣所著界图，悉循洋本翻译汉文，图中山川地名边疆界线无非照依洋本描画，在当时只冀图之速成，何遑计及中彼奸谋贻患异日？”②

第三，正确地分析了英国提出这一照会的缘起和所提交换条件的荒唐可笑，说，“英人得步进步，初意尚欲侵我内界，故暗使坎巨提求垦喇斯库穆荒地以为尝试。乃始因令其立据纳租，继以俄人借口，遂作退计，”才提出“与我立约划界，并请将坎巨提让出。而塔墩巴什及喇斯库穆地本属中，乃云印度代坎巨提让与中国，诚所谓幻想奇谈！”③

第四，指出照会建议的边界线的西端不能接受，必须另议，说：“来文既议界凭天然，何以竟舍天然险峻与巨岭脉络相联之明铁盖达坂，而反从小帕越界入我腹地，渡塔墩巴什最近之噶喇西噶河④，谬指鸿沟，占我雄胜？”因此，必须“撇开塔墩巴什另议”⑤。改为从克里克山口，经明铁盖山口向东南行，自红其拉甫山口以下，始可依英使照会原文所议；

第五，关于阿克赛钦地区，黄光达在审查意见中写道：“其阿克赛成平川，英人垂涎已久，常派员裹粮进山，在该处屯留经旬不去。凡由于阗前往后藏游历者，多向此道行走，凿开山路之说实亦有因。曩年英员马继业呈送巡抚印度舆图，用色线将阿克赛成并附近地方圈入克什米尔省界内，嗣与马继业辩论，允为函知克省官员各情。今与立约划界，须将阿克赛成山地确系新疆内界，又非孔道，嗣后英人不得在此界内游历往来，并将于阗县属泡落庄，即波鲁，入山封禁之路重加掘截各节，于约内切实注明，以断葛藤。”⑥这一段话怎样理解呢？

首先，“曩年……与马继业辩论”一段，指的就是1896年黄光达向马继业提出阿克赛钦

①中国外交部编：《官员报告》中文本，印方，第165页。又第338页，证据第47号。

②《新疆图志·国界志》第五卷，第36页。

③同上，第37页。

④按即卡拉秋康尔苏河。

⑤《新疆图志·国界志》，第五卷，第39页。

⑥同上，第40页。

地区是中国领土，马继业赠送地图，二人反复辩论的一段故事，因此，黄光达对于这一地区双方观点的分歧是很熟悉的。其次，当时所用各种地图，画法多有不同，对这一带山川的称呼也各有歧异。李源钅所绘《莎车、叶城各属东南边界图》，既无经纬度，也未使用“阿克赛成”或“阿克赛钦”等字。许景澄所译《新疆西南各回部图》不包括这一地区。只有洪钧所译《中俄交界全图》使用了“阿克赛成平川”等字，并标在东经80度之东，这是因袭俄图，是错误的。“阿克赛成”或“阿克赛钦”，突厥语，意思是“中国的白石滩”，是整个这一台地的一个泛称，它的范围跨越东经80度两侧，西主要部分在东经80度之西。英国地图习惯用“阿克赛钦”一字，标于东经80度之西，马继业译绘的《洪大臣图》就做了这样的改动，马继业赠送的庄士敦等人所绘《印度地图集》，画法相同。此外，英使照会中所谓“拉宗山岭”，在黄光达所用各图中一概没有标明，黄光达说：“拉宗山岭，洪、许各图皆无此山名，唯洪图科则勒治勒戛东南有地名灵吉塘，拉宗山岭当与灵吉塘相去不远”。<sup>①</sup>这些情况，特别是洪图对“阿克赛成平川”的错误画法肯定给审查照会工作造成了不少困难。

黄光达在审查照会建议的边界线时，主要的依据是李源钅的报告。李源钅在踏查新疆与克什米尔之间边界以后，1893年呈报了《查复莎车、叶城各属东南边界图说》一份。其中正文部分详细叙述了自己自素盖提历经康挖克、阿吉栏干、塔拉塔得、克奇克库里至昌器利满达坂等十三个地点之间的方向、里程与沿途见闻。在前言部分总结说：“由阿吉栏干上山坡西南行，过土达坂有通于阗之道。按洪图穷咨博访，多不知有通藏之道，仅有一二知者亦属传闻。询之，尽属沙砾，又无水草，瘴风最烈，人马难行。其经过塔勒塔得、克奇克库里一带，无高山，水无分合，除戈壁以外，皆平坦山路，东望约二、三百里无山间隔，西顾数十里始有山峰。仍南趋，过土达坂，上平下陡，百余里至昌器利满达坂，独起高峰，天然劈划。迤南分幹挺拔，尖峭耸嶂；西行为退摆特隆角尔赛赛尔一带冰山，接连西北雪峰，约二、三百里，则为卡拉胡鲁木达坂，皆与退摆特接壤。”<sup>②</sup>他这里所说的退摆特即拉达克；卡拉胡鲁木达坂即喀喇昆仑山口；昌器利满达坂又名昌隆巴马或者昌隆巴尔玛列山口，在空喀山口附近。按照李源钅的叙述，这一带边界从昌器利满达坂到喀喇昆仑山口，与今天中国政府所主张的传统习惯线是基本一致的。

我们从上引黄光达的审查意见里，可以看出他着重地使用了“阿克赛成山地”一词，以与“阿克赛成平川”相区别，意思是说英使照会建议线的东端也不能接受，不能到达洪图所标的“阿克赛成平川”，而是仍然要按李源钅的结论，自喀喇昆仑山口到昌器利满达坂，把“阿克赛成山地”全部划在中国界内。

新疆巡抚饶应祺认为黄光达所议甚妥，据以回复了总理衙门。

黄光达奉命办理此事是在1899年5月17日，复文送到总理衙门估计不会早于7月上旬。以后总理衙门并没有答复英国公使，由于英印政府态度逐渐变化，英公使也不再追问。总理衙门对此事如何考虑办理，在中国史料中尚未发现相应记载，不过按照英国文献所记，这段时间前后发生的有关事件，对总理衙门的态度肯定会产生影响的。

自1898年冬至次年春，坎巨提在英印政府支持下，一再催促喀什当局与它订立喇斯库穆

<sup>①</sup>同上，第36页。按科则勒治勒戛即克孜勒吉勒尕，灵吉塘即林济塘。

<sup>②</sup>同上，第2页。

租地契约。1899年1月，俄驻喀什领事彼得洛夫斯基扬言，如中国允其所请，俄将在色勒库尔设立哨所。俄公使在北京对总理衙门进行了同样的威胁。不久，英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命驻俄大使斯考特（Charles Scott）向俄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M.H. Муравьев）询问此事，穆拉维约夫否认俄有意施加压力。索尔兹伯里命驻北京代办艾伦赛（Bax Ironside）据此告知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十分不安，认为此事一旦演成英俄相争之局，中国势将难以应付。这时中俄关于帕米尔未定界的交涉仍在进行，总理衙门认为如允坎巨提要求，势将引起俄国对色勒库尔提出要求。6月底，俄国态度转趋强硬，穆拉维约夫对英代办哈定（C. Hardinge）说：“俄国在帕米尔的地位处于被侧翼迂回与包抄的危险之中，……印度政府的举动……将被看做是对帕米尔条约所创造的局面加以改变。”①俄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А.Н. Куропаткин）也对一位英国军官发出强硬的威胁说：“如果你们的坎巨提人到喇斯库穆去，我们将被迫接管喀什噶尔和塔什库尔干等地。”②总理衙门认为英国一面建议立约划界，“让出”喇斯库穆等地，一面又主使坎巨提索求不已，态度矛盾，难以捉摸。喀什当局直截了当地通知坎巨提说，总理衙门在北京已与英、俄公使谈妥，不许坎巨提耕种喇斯库穆土地。穆拉维约夫一再向英使表示希望了解坎巨提在喇斯库穆要求耕地，面积究有多少。8月，英使斯考特告诉他不超过三千英亩。9—10月，穆拉维约夫与俄驻北京公使态度相继缓和下来，唯有它的喀什领事态度强硬依然如故。1900年1月，斯考特向穆拉维约夫提出质问，穆拉维约夫含糊其词，不做明确答复。窦纳乐以此告知中国。此后数月，总理衙门始终认为事情并未澄清，矛盾远未结束。新疆当局对与坎巨提订立租地契约一事也一直拖延不办。1900年夏，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清政府无暇再顾此事，所谓对英国要求划界的建议如何答复问题，从此无限期地搁置下来。

## 五、研究1899年照会的现实意义

1899年照会虽然没有产生任何结果，但是具有很深的现实意义。

人们读了1899年照会的原文，研究了与此有关的历史，每一个尊重事实的人都会承认：第一，此项照会是要求正式划定新疆与克什米尔之间的中印边界的一次具体的建议；第二，它所建议的边界线把喀拉喀什河河源一带全部留在中国境内，远在印度今天主张的边界线之南；第三，中国政府没有接受这次建议。新疆当局初步审查了它所建议的边界线之后，对东西两端的具体划法都有异议。

这些事实虽然只涉及到中印边界西段中的阿克赛钦部分，同时又只是这一部分中的问题之一，可是它的意义却宽广得多。它不单说明印度今天所主张的边界线至少在阿克赛钦地区的一段不能成立，同时还能够证明印度政府在整个中印边界争端中的一贯立场也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如前所述，自从中印边界争端发生以来，印度政府的一贯立场，一是它所主张的中印边界线是已经划定了的，没有理由举行全面的边界谈判；二是印度政府目前主张的中印

①FO 539/81, 第1号，哈定致索尔兹伯里函，1899年6月28日，转引自A·兰姆：《拉达克部分的中印边境》，第53页。

②FO 539/81, 第6号，斯考特致索尔兹伯里函，1899年7月12日，转引自同上书，第54页。